

论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四重向度

张 昂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高校党建工作。在全面抗战时期,党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在根据地高校进行了丰富的党建实践活动,这些具体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培养了人才队伍,积累了宝贵的高校党建经验,这些富有生命力的经验对于新时代开展高校党建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

中图分类号:D26;K2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1-0023-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1.004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lleges on the Resistance Ba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ZHANG 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lle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the Party carried out various activities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lleges on the resistance bases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se specific practice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ined talents for the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lleges, 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arrying out Party building in the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resistance base; college; Party building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新型高等学校的重要时期,在根据地兴建了一大批新型高校,如陕甘宁根据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晋察冀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

学,鄂豫根据地的“抗大”十分校、洪山公学等。对于当时高校党建工作经验并不十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在特殊的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利用高校党建工作为党培养抗日人才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张昂(1998—),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与在沦陷区和国统区高校采取的“秘密建党”或者“半公开化建党”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高校中采取了“公开建党”的方式,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开展高校党建工作,并坚持教育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开展了在自己政权管辖范围内进行高校党建的首次尝试。全面抗战时期党在根据地高校进行的党建实践活动为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开展高校党建工作奠定了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因此,加深对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历史考察,从历史实践中总结高校党建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缘起向度:全面抗战时期加强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缘起之因

全面抗战时期党加强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有着一定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缘起之因。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非常重视青年工作,这为党在高校这一青年群体聚集的地方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其次,党成立以后在高校党建工作方面的探索直接为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的党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再次,大量身份复杂的知识分子涌入根据地求学的客观形势,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和为抗战前线输送人才的迫切需要要求党必须加强根据地高校的党建。

(一)理论缘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青年工作的必然要求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青年的综合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同时也关乎政党的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并提出领导青年工作的思想理论,为全面抗战时期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列宁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引领青年、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首先,列宁认识到革命时期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对青年加以引导,动员青年参加斗争,不要对青年不放心,因为斗争的结局“取决于青年大学生,尤其是青年工人”^[1]。

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抓住青年人,那么青年人便会被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其次,他提出了革命时期青年工作的目标要求,即培养青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他强调要用正确的纲领引领学生,而且“应当到最广泛的大学生中间去开阔学院派的眼界和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样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任弼时在五卅惨案之后发表了《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其中指出青年学生是“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3]的群体,指明青年学生在反帝运动中的责任与地位,强调党必须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开展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指出,青年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否则只会把他们拱手送给豪绅资产阶级^[4]。毛泽东还强调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引领,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号召青年要走到革命队伍的最前面。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到了“某种先锋队”的带头作用。他还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要走群众路线,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5],汇聚成打倒帝国主义的磅礴力量。党在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党建工作的重点就是开展青年工作,而列宁及中共领导人关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思想给开展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历史缘起:吸取建党以来高校党建经验的必然结果

党自成立以来就对高校党建进行不断探索,为全面抗战时期在根据地高校公开建党和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建党初期,党就和高校师生有着密切联系。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名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其中 10 人具有大学学习或者工作经历。到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国可查的 38 个党支部中,高校党组织占 7 个,余下 31 个党支部也全是由高校党员建立或在他们的领导下建立的^{[6]41}。由此可

见,高校对党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党初期党在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等学生团体中植下根基,建立起高校的党组织,开启了对高校党建工作的初步探索。

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在军阀统治的高校、党主持或者创办的高校以及国共合作的高校中开展政治工作。在此期间,高校党建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导党员与进步师生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领导制定学生运动的方针和策略;三是贯彻党的国共合作方针,帮助国民党推动大革命发展^[7]。由国共合作创办培育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上海大学,是此时期高校开展党建工作的典型代表。上海大学基层组织健全,较早成立党支部。在教学上,上海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加强阶级教育,培育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学生,这些革命学生协助老师开办工人夜校,启发工人革命意识,领导或参与工人罢工活动。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大学师生与工人阶级并肩作战,给予了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公开的或秘密的党组织大多遭到严重破坏,高校党组织也未能幸免于难,高校党建工作因此被迫停滞。在此期间,受到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产生了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中共六大甚至产生了明显的“工学界限”^{[6]139},出现了歧视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排斥知识分子入党的现象。在这种“内外”夹攻之下,高校党建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党内的“左”倾思想被扭转过来,高校党建工作才逐渐恢复,并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红军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等干部教育学校,并在这些学校内设立大学委员会来领导学校工作,同时加强党的理论与政策教育,强调在实践中锻炼学生。这些干部教育学校完全是由党创立并领导的,为后来全面抗战期间党在根据地高校的党建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启示。

(三)现实缘起: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和打赢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人才保障的现实要求

一方面,大量身份复杂的青年学生涌入根据地高校求学的客观形势要求加强高校党建工作。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步伐的加大,国土不断沦陷,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一大批怀揣着抗日救国抱负的青年,奔赴以延安为主的根据地进行学习。这些青年的身份复杂,文化水平、家庭背景与阶级出身各不相同,给根据地高校政治工作与教育教学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提升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成为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战士,实现“无产阶级化”,根据地高校努力加强党建工作,吸收优秀青年学生入党,给党组织注入新鲜的血液,以壮大党的力量,夺取革命的胜利。

另一方面,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是为了巩固根据地政权和为前线输送人才。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革命的成功与否,但当时根据地大多刚刚成立,干部素质普遍不高,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在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以巩固根据地政权。另外,根据地高校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培养抗日干部,通过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以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打赢民族解放战争。

二、实践向度: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的具体实践

全面抗战时期党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等方面,对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办学的根本原则

要想在根据地办好高等教育,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办学的根本原则,这本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些党内领导人受右倾错误思想影响,在办学之初淡化了党对高校的领导。如

王明认为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是抗大团结胜利的基础”^[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驳,强调党必须掌握根据地兴办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毛泽东认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9]。除了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外,中央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加强根据地高校党的政治建设。

首先,在领导方式上,规定延安根据地高校直属党中央相关机构,并且在有些学校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使根据地高校教育与中央工作部门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各高校直属党中央相关机构,比如“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中宣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10]762}。除此之外,根据地高校探索出了新型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比如陕北公学就实行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1]16},学校最高领导是党组,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直接领导,党总支在党组领导下管理党务工作,校长在党组的领导下负责具体的教学任务,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党对高校的领导作用。

其次,在抓领导班子建设上,党特意抽调了一批党内久经考验、政治素质高的老干部来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利用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较高的政治素养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实现办学目标提供保证。比如毛泽东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林彪、刘伯承、陈云、成仿吾、李维汉等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先后担任根据地高校校长等重要职务。校长以下的干部也是任用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将。如陕北公学中邵式平任教务长,他曾是赣东地区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周纯全任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部长。此外,中央宣传部还指示华北联大设置专门的干部处,负责干部的登记、调动与保健等工作。

再次,在党管人才上,根据地高校集聚优秀

人才,以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一是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根据地高校对教员的选拔极为严格,把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不怕困难作为重要标准,因为选什么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工作作风。二是注重改善教员的待遇,为其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应该负起责任,给予“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要改善教员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10]762-763}。

最后,在思想引领上,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重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不断提高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比如中宣部曾指示华北联大党委要加强党员教育,“除同一般学生上课外,应在支部中特别加深党的建设及党的策略的教育。支部书记应以不脱离学习为原则”^[12]。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学生思想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阶级成分构成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比少,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占比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众中开展党建工作的课题。根据地高校师生身份复杂,以“抗大”为例,其学生主要是由党政军机关中的工农党员干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归国华侨青年组成^[13]。其中,工农党员干部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不一定完全入党,其思想、工作作风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多属于小资产阶级成员,不可避免地会沾染非无产阶级思想。针对这些情况,根据地高校党组织采取学习教育、思想改造以及实践锻炼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与改造,纠正其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其思想建设。

首先,根据地高校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对党员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党的建设知识等教育。第一,改造原有课程,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课程。针对从沦陷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根据地高校改造原有课程,推

行新课程。如温济泽在《抗日三年来敌我教育战线上的斗争》中提及:在实行抗战教育的学校里,把一切与抗战无关的旧课程统统改造,并且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新课程,如政治常识、军事常识、统一战线等。教材内容也有新的创造,即“以抗战建国为中心,特别注重于民族觉悟的提高、民主精神的发扬,以及前进的科学知识的灌输”,对于反共灭党、东亚新秩序、假“三民主义”等“一切奴化理论”都给予致命的打击^[14]。陕北公学针对工农干部开设高级班,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农干部,开设“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等课程,使学生更加深入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第二,邀请党中央重要领导人讲课或者作报告。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董必武、陈云、王若飞等众多党的高级干部都曾到学校进行过授课或者汇报。毛泽东曾在“抗大”讲授过《矛盾论》与《实践论》,使学生认识到信奉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帮助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党的领导人也会给学生介绍国内外形势,比如周恩来在陕北公学曾作《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和《平江惨案情况》的报告。通过国内外形势教育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学生认清革命形势,明确斗争方向,提高政治觉悟,这为先进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第三,成立读书会、俱乐部、青年队流动宣传队等组织,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拓宽视野。除此之外,党组织还通过开展学习竞赛营造竞争氛围来调动学生接受学习教育的积极性。

其次,在运动中进行思想改造是这一时期高校党建工作的开创性实践。由于党内仍然存在“左”倾与右倾的错误思想,加之各种良莠不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决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以此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据地高校的师生也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进行了集中的学习与整顿。成仿吾在《华北联大三年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及,在“整顿三风”的工作

检查中发现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有的,“没有能全面一贯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所以应该提高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所学与所用的联系^[15]。鲁迅艺术学院于1942年4月成立了“鲁艺整风委员会”,各系设立了整风领导组织。同时,各个支部都积极地组织学员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相关文件,比如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整顿主观主义的学风,破除党八股的文风。通过整风运动,学生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改造,认识到艺术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参与实际斗争,必须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

最后,实践锻炼也是进行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地高校党组织通过分派学生深入群众进行宣讲、参与民众运动、参与社会劳动等方式,使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思想觉悟,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比如,陕北公学开设了“民众运动”这门课程,由邵式平主讲,讲授“如何动员、组织、训练、领导广大群众参与抗日战争,掌握党在民众运动中对各阶层的政策”;与此同时,学校规定每周三为“救亡日”,在这一天会组织学生走出学校,投身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开展政权工作或统一战线工作,向群众讲解国内外形势,调动群众参与抗日救国的热情^{[11]37-38}。这是理论教育法与实践教育法相结合的生动事例。根据地高校党组织也会开展劳动锻炼,以塑造学生正确的劳动观。根据地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劳动委员会,制定学生的劳动计划,组织学生参与耕种、织布、修建校舍等活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群众,如帮老乡砍柴、耕地、浇水;医科大学的学生给老乡看病;自然科学学院的学生利用专业知识帮助群众提高生产力。劳动锻炼使得作为知识分子的学生与工农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走上与劳动群众结合的道路。

(三)以组织建设为保障,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

首先,积极而谨慎地发展党员。第一,在入

党标准方面,破除“唯成分论”的“左”倾倾向,同时也禁止“拉伕主义”的做法。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打破以往因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而存在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正确对待发展对象的个人身份和家庭出身,积极吸纳优秀学生入党。但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也非常谨慎地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防奸细混入学校。比如鄂豫根据地的“抗大”十分校成立政治部主持发展党员的工作,组织对学生党员进行政治鉴定,并设定固定的时间对新党员进行教育——“党员教育每周一时半,特殊教育可于周日进行之”^①。在积极吸收党员的同时,又严禁强迫入党,反对“拉伕主义”。比如“抗大”十分校负责人任质斌曾提及“在入学的时候,他没有党籍、军籍的限制”,“也不准备用‘集体入党’的方式逼迫任何青年参加自己所不愿意参加的政治团体”^②。第二,按照一定的程序发展新党员。高校基层党组织在考察入党积极分子时,首先会调查其家庭背景,然后派党员与之接触,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其平时的思想动态,基层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确认其符合党员的条件和标准后,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上级党组织同意后,党组织派人再与其进行谈话。新党员必须填写入党志愿书,还需要有两位入党介绍人。经总支批准后,新党员完成宣誓仪式,成为正式党员。

其次,加强党支部的建设。第一,从思想上认识到党支部建在班级或者学校的重要性。鄂豫根据地负责人李实认为:“支部建在班级或者学校,是办好教育事业的保证。”^③鄂豫根据地借鉴红军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成功经验,在洪山公学、行政干校的各个班级成立党支部,党支部按时召开支部会、党小组会,传达文件,讨论党的中心工作,进行敌我形势分析等。第二,坚持常抓党支部内部的政治生活。比如延安大学党支部组织活动的方式是召开生活检讨会,每周一次。其内容是党员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

工作情况,自己先做评价,后集体评议,最后达成一致意见^[16]。通过固定时间在党组织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和规范了党内的政治生活。第三,营造民主氛围,促进党支部建设。根据地高校管理方针的决定、教学工作的安排大都采用民主集中制。除此之外,在班组会上,学生可以给教员以及党员干部提批评意见,以便其改进工作^{[11]70-71}。根据地高校的这种工作方式,无疑给党支部提供了一个民主的氛围。

最后,颁布制度条例,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任何组织的运行,都离不开刚性的制度规范。制定严密的制度,可以对组织内部的成员起到令行禁止的约束作用,保障组织顺利运作。根据地高校为了使党建更有力、更规范,除了遵循党中央颁布的有关条文,如《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外,还出台了一些具体规范高校内部党组织运行的条例。因为此时高校党建尚处于探索时期,有关条例并不成熟,但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如1937年12月16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颁布的《抗大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对8个部门进行了规范,比如规定政治部应该指导全校政治工作计划;总支委应该在政治部领导下领导全校工作,负责召开全校党的重要会议(积极分子大会、总支委大会、总支委扩大会、全校党员大会),审查及批准新党员^{[17]67-68}。

(四)加强纪律建设,树立党员优良作风

首先,加强纪律教育。比如“抗大”邀请党内高级干部作纪律教育的报告,陈云在该校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新党员涌进党内,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所以要加强对新党员的纪律教育。他还强

①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Z],1984:19.

②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Z],1984:3.

③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Z],1984:115.

调:“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18]

其次,完善各项制度,使纪律建设有章可循。1938年,罗瑞卿主持编订了《抗大组织条例》,它的颁布使得“抗大”教学教务工作有章可循。该条例有着高度的约束力,遵照此条例可对违法乱纪者进行严肃处理。除此之外,1938年党还颁布了《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进行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其中规定,如果有与上级党委意见不同的情况,可向上级申诉,但“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19],这加强了对高校党组织的制度规范,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最后,坚定执行党规党纪与法律法规,对违法乱纪行为严惩不贷。比如当时根据地高校中发生的“黄克功事件”。黄克功是革命功臣,战勋卓著,他那时正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五队队长,也是一名老党员。正因如此,他才居功自傲、肆意妄为,因为在学校里求爱不成,便枪杀了女学生刘茜。这件事引发了社会轰动,对他是否判处死刑争议非常大,反对死刑的人认为党刚刚在延安稳住阵脚,判处有功之臣死刑会引发骚乱,还有些人认为其功劳大,可以免死,应该让他上战场将功补过。但毛泽东认为黄克功已经丧失了人性和党性,“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20]。最终根据地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这体现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严肃法纪、严惩党内腐化堕落分子的坚定决心。

三、成就向度: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历史成就

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地位关键,作用巨大,它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其积累的党建经验给非根据地乃至后来的

高校党建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传播革命火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首先,根据地高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高校党组织通过在根据地高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邀请领导人作报告、发行宣传册等方式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火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与传播者。其次,根据地高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阵地。一批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奔赴各根据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比如艾思奇、张如心、吴亮平、成仿吾、范文澜等,他们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和中共领导人保持紧密联系,与之形成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互动机制。他们的著作,为党的领导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最后,根据地高校是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才的重要阵地。根据地高校党组织紧抓思想政治工作,把一批批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培育革命先锋,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这一时期高校党建的主题是为党的目标和任务——打赢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所以根据地高校坚持目标导向,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与教学任务联系起来。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还教授游击战术、群众运动、基本政策、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为抗日前线和根据地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人才。比如“抗大”在9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10万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17]3},陕北公学为抗日战争培训了13000余名抗战干部^{[21]35}。有些学员奔赴前线,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学员奔赴各根据地,参与根据地政权的管理与建设,巩固共产党局部政权,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稳定的后方环境。比如华北

联合大学第一期 1 000 多名毕业生,“根据地的党、政、军、文教部门,抢着来要”,这批学生大多成了部门骨干,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司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11]152}。

(三)积累党建经验,为非根据地和后来高校党建提供借鉴

首先,根据地高校与非根据地高校之间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校际互动,它们互通往来,国统区和沦陷区高校中的一些党员干部或者学生被送往根据地高校学习后,会把根据地高校的党建经验带回去,帮助党在不能公开建党的地区开展党建工作。比如 1943 年,中共山东分局青委为了引导沦陷区青年积极抗日,提议将大城市中的进步青年介绍到根据地进行短期培训,之后将其派到大城市“以上学掩护工作”,让他们团结非党员同学,对那些靠得住的“同学亲友做些口头宣传”^[22],激发沦陷区青年抗日的积极性。其次,根据地高校的党建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如今的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根据地高校采取的一些党建做法,比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内部保持民主作风以及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对当下高校开展党建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现实向度: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当代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加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需要以史为鉴,需要吸取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习近平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23]新时代高校党组织需要把高校党建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抓手,加强高校党的作风与制度建设,并以党建工作引领高校教师队伍建,不断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的质量。

(一)新时代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做好高校各项工作,首要的就是要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高校均把党的领导作为办校的最高原则,坚持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根据地高校的领导权直接放在党中央的管理之下,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注重用思想引领的方式加强政治建设。新时代开展高校党建工作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首先,在领导体制上,需要吸取根据地高校的成功办学经验,必须毫不动摇地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落实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其次,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到实处,把那些德才兼备且群众认可的干部选拔到高校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把各类优秀人才凝聚到高校中来。最后,要健全高校党的组织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完善的组织建设来保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新时代要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

根据地高校党建工作的经验表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武装全体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党建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当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仍然存在问题,比如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中,15 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 31 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其中有些高校存在着“防范意识风险不够有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思政课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容忽视,高校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具言之,首先,要严格全面地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坚持党委领导、各部门协调,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其次,要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坚决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

阵地。最后,要善于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让广大师生在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三)新时代要以党建工作引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根据地高校党组织非常重视对教师队伍的培育,在选聘教师时,要求根据地高校聘请理论功底扎实、政治素养高的教师,以保证他们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任用之后,还要加强对教师进行政治审查,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10]762}陕北公学当时还专门成立了高级研究班,让教师一面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一面进行教书育人的教学活动。新时代高校教师担负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使命,所以高校是否有一支政治素质硬、专业素质高、道德品质高尚的教师队伍决定着教书育人的效果。因此,首先,要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高校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发挥其政治领导的功能,强化教师党支部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党员教师的职能;其次,要不断提高党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素养,引导党员教师自觉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增强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新时代要坚持加强高校党的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根据地高校十分重视加强党员的作风建设,在延安整风期间,延安大学通过开展反对自由主义大讨论进行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的问题主要有:校风校纪,群众利益,生活检查,学习上的自由主义,工作上的自由主义,非组织活动等”^{[21]70},纠正了高校党组织存在的不正之风。新时代加强高校作风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严肃高校党内政治生活,净化高校党内政治生态,构建良好的高校党内政治文化。坚决反对高校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次,要运用典型教育法,收集整理高校作风优良党员

的正面案例,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同时择选反面事例来发挥警醒作用,在氛围浸染中使师生党员提高学习模范的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从而加强高校党的作风建设。最后,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健全高校党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为新时代改进高校党组织作风提供有效保障。

(五)新时代要加强高校党的制度建设,提升高校党建的制度化 and 科学化水平

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党中央和高校党组织制定相关条例,以刚性的手段保障高校党组织的严密组织性和严明纪律性。新时代加强高校党的制度建设,首先,需要保证高校相关制度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相一致,在制定规章制度时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根据具体实情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修改与新形势发展相矛盾的制度,对于那些笼统模糊的制度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力求构建操作性强、相对完备的制度网。最后,要提升对制度的执行能力。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地执行相关制度;加强对制度的宣传工作,强化党员对制度的认知;加强对制度运行情况的监督,视情况可成立针对制度运行的“监督小组”,制定详细的监督检查方案,确定监督的重点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严格实施监督检查,如发现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及时反馈,并推动相关单位进行反思与整改。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28.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5.
- [3] 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
-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5. (下转第108页)

- [2] 寺村滋.『羅生門』の精神分析の解釈[J]. 国語国文学,1970(2):36-55.
- [3] 刘金举. 自卑对芥川文学的决定作用: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J]. 国外文学,2008(1):115-121.
- [4] 劳雅钦. 试用精神分析法探析“杜子春”的行为变化[J]. 文学教育(下),2019(5):112-123.
-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周珺,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
-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 [8] 陆扬. 精神分析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3-55.
- [9] FUMINOBU M.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M]. Assen: Van Gorcum,1996:33.
- [10]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65.
- [11] 池上貴子.『羅生門』論:末尾改稿を軸に[J]. 日本文学研究,2004(1):84-93.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 31 页)

- [6] 周良书. 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 李向勇. 建党百年来高校党建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J]. 毛泽东研究,2021(3):90-100.
- [8] 盖青. 1921—1949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17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M]. 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成仿吾. 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526.
- [13] 周靖程. 透过文物看抗大总校的学员构成 [J]. 炎黄春秋,2017(12):89-93.
- [14]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5 册[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95.
- [15] 成仿吾. 华北联大三年的回顾与展望[N]. 晋察冀日报,1942-07-03(4).
- [16] 王云凤. 延安大学校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22.
-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7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20.
- [19] 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J]. 共产党人,1939(1):78-80.
- [20]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0.
- [21] 《延安大学史》编委会. 延安大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2]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6 册[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58-159.
- [23] 习近平.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N]. 人民日报,2014-12-30(1).

(责任编辑:李秀荣)